

李鴻章傳



李 鸿 章 传

苑 书 义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历史名人丛书

李 鸿 章 传

LIHONGZHANG ZHUAN

苑书义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25印张 317,000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200

ISBN 7-01-000862-0/K·80 定价 5.60 元



目 录

引言	1
一、“读书但愿登科第”	3
“庐郡望族”	3
“少年科第”	9
二、“以儒生而起家军旅”	20
帮办安徽团练	20
投身湘军幕府	32
编练淮军	42
就任苏抚	51
“练兵练器”	60
“抚用容将”	71
“用沪平吴”	80
“霸术”与“德政”	91
三、“自强”与“剿捻”	102
署理江督节制两湖	102
引进“制器之器”	112
培养“制器之人”	124
督师“剿捻”	131
四、“富强相因”	142
移督直隶	142

DK 21/50

揭示洋务总纲·····	161
提振军事工业·····	168
兴办民用企业·····	173
筹建北洋海军·····	196
兴学育才·····	216
五、早期“和戎”外交 ·····	232
议结天津教案·····	232
从“联日”到“联俄拒日”·····	236
中秘和中英交涉·····	245
在中法和战的漩涡中·····	257
六、“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	277
“能柔朝鲜而不能折日本”·····	277
避战主和·····	293
消极防御·····	303
“暂屈以求伸”·····	313
七、“山穷水尽疑无路” ·····	326
投闲京师·····	326
“老来失计亲豺虎”·····	331
游历欧美“顿扩灵明”·····	341
“维新之同志”·····	351
八、“秋风宝剑孤臣泪” ·····	364
回光返照·····	364
在民族屈辱中升迁·····	378
“结与国之欢心”·····	388
附录：李鸿章家世简表·····	408
后记·····	419

引 言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孟浩然

有人说：“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然而，在书写历史的成千上万、多姿多彩的人群中，真正能够在绚丽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个人印记的为数是多么的少啊！李鸿章生活在“四海变秋气”的封建末世，长期沉浮在腐朽与神奇、黑暗与光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激烈搏斗的漩涡之中。他在生前和死后，人们始终对之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的给他戴上“东方俾斯麦”、“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桂冠，有的则斥之曰“李二先生是汉奸”、“乱世之奸雄”。他在晚清政坛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

呢？溢美违背历史真实，因义愤而贬损不能推进科学。那就让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一下他那奇幻般的生涯吧。

“庐郡望族”

按照传统习俗，过了阴历年初一，初五便是新春里最重要的日子，因为正月初五是“财神”生日，人们一年的财运似乎都是由“财神”决定的。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正当人们忙着置酒席、接“财神”、欢庆“财神”生日的时候，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李氏宗族更是欢声笑语，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之中，因为又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呱呱坠地了。这位在“财神”诞辰降临人世的婴儿，就是后来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烜赫一时的李鸿章。

李鸿章先世本姓许，自江右湖口迁至合肥。合肥位于长江、淮河之间，

在美丽富饶的巢湖北岸，属于巢芜盆地，土地广沃，澧水停注，旱涝保收，“民物殷富，俗尚勤俭而崇节义”。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心庄无子，请求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迎溪慨然允诺，慎所遂改袭李姓。因而李门祖规：许李二姓不通婚，而与族外之李则不禁。李氏“世耕读以为业”，初“清贫无田”，至鸿章高祖时，以所谓“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从“清贫无田”到拥有二百亩土地，表明李氏已经发展成为新兴地主。但因李氏有钱无势，缺少政治靠山，“乡曲豪强屡见欺凌，数起讼端”。鸿章曾祖李椿“和众能言，不畏强御，申辩得直，然后安居焉。”^① 鸿章祖父名殿华，字庆庵，“肆武游庠”，两应乡试落第后，便放弃猎取功名念头，退居乡间课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近五十年，“男耕妇织，督课勿懈。”^② 殿华凭藉祖先余荫，虽然继承了一些土地财产，但因李氏宗族繁衍，家大业小，在析居分爨时，殿华一支“推多受寡”^③，分得的土地财产不多。所以在现存文献中，往往有殿华役使佃户、雇工和家境穷困的似相抵牾的记载。殿华之子追忆说：“凡田亩近坟冢，春耕〔其父〕必督佃户雇工坟旁多留隙地，无主者亦培土于其冢，使无倾塌。”^④ 殿华之孙却描绘出另一番情景：“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对。支吾终非久长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其时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积蓄，时为周济，并劝祖父以勤俭，并亟命儿孙就学，吾祖父从其言，得有今日。”^⑤ 殿华可能是个小地主。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小地主家庭，是典型的所谓“耕读之家”。

殿华生有四子，依次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长子文煜，

①④ 李文安：《都门望云思亲赋》，《李光禄公遗集》，卷1，第1、4页。

②③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50，孝友传一，第31、30页。

⑤ 李鸿章：《致鹤章弟》，《李鸿章尺牍》，第34页。

字晴岚，庠生。据说他“居家孝友，博学能文，……名望重于士林，早有经师宿儒之誉”。他因家贫就馆于外者6年，之后“闭门收徒，兼课子弟”，对李氏宗族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沈葆楨说：“李氏书香之盛，英才之多，位业之隆，门闾之大，谓非由公一人创兴而起者欤！”^①他著有《晴岚文集》20余卷。次子文瑜，喜好吟咏作赋。三子文球，著有《妙香亭文集》。四子文安，即是鸿章父亲，本名文珩，字式和，号玉泉，别号愚荃，生于1802年（嘉庆六年）。文安启蒙后，与其兄一起读书，殿华“时亲督课，每作文脱稿”，“必先阅，指其瑕疵”。文安兄弟每当“早起问安及夜读归卧”，殿华“或为讲书史懿训，或为述先曾祖暨先祖盛德”^②。文安8岁时受业于李龙桥，因“师有家务”，而自身“少又多病，至年十三仅读四子书及毛诗，而未能成诵。”殿华忧心如焚，让他回来跟着长兄文煜读书。文煜教授自己的兄弟，自然严格认真，每年从正月初三开学，直至除夕始辍。文安也自知“资性中下”，只有勤奋学习才能有所长进，因而摆脱家务，遏制邪欲，专心攻读。他在《寄弟书》中追忆说：

仆少本慵愚，惟耽章句。米盐烦碎，七字未亲。声色繁华，四魔早却（吃喝嫖赌，仆尝谓之四魔）。虽得天之独厚，家督自有担承。实所见之尚超，细务慨从推脱。是以毕志读书，专攻进取……^③

文安除了就学于其兄外，还曾先后拜童培山、杨静闲、汪子庄等为师。庐阳书院山长杨静闲，擅长制艺，文安说自己“制艺得力于〔杨〕师者最多”^④。从1822年起，文安一面刻苦读书，一面开馆授徒。

① 沈葆楨：《李晴岚赠公家传》，《合肥李氏宗谱》，卷15，第6页。

② 李文安：《都门望云思亲赋》，《李光禄公遗集》，卷1，第2、4页。

③ 《李光禄公遗集》，卷7，第19—20页。

④ 李文安：《都门望云思亲赋》，《李光禄公遗集》，卷1，第2页。

殿华督促文安兄弟潜心攻读，企图使他们通过科举途径攀龙附凤，攫取功名。所以当文煜、文安考取秀才时，殿华曾亲自送场。1825年文安初次参加江南乡试，殿华盼子成龙心切，又亲自将爱子送到南京，并与之一起参观名胜古迹。文安此次南京之游，既开阔了眼界，又因考试落榜而羞愧万分。此后，文安曾多次赴南京应试，结果都名落孙山。这对于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士子来说，在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深受痛苦折磨的文安，常常借酒烧愁，赋诗自嘲：

年来落魄多贪酒，
老去猖狂半在诗。^①

他慨叹自己功名未立，深感负疚多端，因而“暮鼓听以惊心，晨钟动而猛省，追维前事，托诸短吟，自誉自嘲”，写成《自讼十五首》。

难得群公盼转青，识韩御李旧恩铭。

祇今虚费黄官粟，潦倒风尘两鬓星。^②

他在这首诗的自注中写道：“予屡试优等，一膺鹗荐，颇邀诸宗工赏识，山长杨静闲、汪子庄二先生极相器重，祇今偃蹇青巾，有负藻鉴多矣。”^③这位“双鬓已皤，一巾仍旧”的李文安，经过锲而不舍的专攻进取，终于在1834年考中举人，4年后又成了戊戌科进士，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在封建社会里，“权”能转化“钱”，政治上得势，同经济上致富是密不可分的。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的李氏宗族，由于文安“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④

李文安是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据说他“内

①② 李文安：《自讼十五首》，《李光禄公遗集》，卷5，第2页。

③ 李文安：《自讼十五首》，《李光禄公遗集》，卷5，第2页。

④ 《李光禄公遗集》，卷8，第2页。

行尤笃，事亲至孝。……为人刚方厚重，然诺不欺，所至皆敬慕之。”在刑部任职18年，审理案件认真负责，公正不阿，“庭诤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因“倔强不苟合”，得不到上司赏识和提拔。他在掌管提牢厅期间，严禁吏卒虐待囚犯，“捐置衣被药饵，夏席冬粥，躬自监视，狱无瘐毙”。著有《贯垣纪事诗》一卷，后为“刑官刊布之以为法。”^①他“少喜作赋”，“性耽章句”。前者殊非所谓“先正根柢之学”，而后者却是带着“圣贤”标记的“科举之学”。

文安夫人李氏，系合肥李洪谟（字腾霄）之女，“秉性淑慎，教子义方”，堪称封建式的贤妻良母。她生6男2女，“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有人担心她家人口众多，生活艰难，而她却坦然以对，声称：“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岷岷有立，岂忧贫哉！”她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让诸子“发愤读书”，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下去。

李文安的6个儿子，依次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皆用其别号“愚荃”之“荃”字取号。他的子孙为避亲讳，凡函牍家书，遇请安字样时，皆以“绥”易安。

瀚章本名章锐，号筱荃，生于1821年（道光元年），文安说他“性本敦笃”，“幼弥精勤”。因父亲在京任职，他作为长子挑起家庭重担，侍奉祖父，照顾弟妹。他既“百口荷一身”，“日日役米薪”；又秉持庭训，专攻举业。他虽然“斐流自成章，所富在多文”，怎奈科场不顺，乡试受挫。1848年文安还赋诗寄情说：“愿即策远志，捷足出风尘。”^②不料，第二年即获得拔贡，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湖南。据说，湖广总督裕泰一见李瀚章，“奇之，曰：‘他日继吾位业必李令也。’”^③

① 李鸿章：《葛洲墓志》，《李文忠公遗集》，卷4，第1—2、3页。

② 李文安：《怀锐儿》，《李光禄公遗集》，卷5，第16、17页。

③ 李鸿章：《清故光禄大夫太子少保两广总督李勤恪公墓志》，《合肥李氏宗谱》，卷15，第15页。

鹤章排行第三，本名章浚，号季荃，1825年（道光五年）生。廪贡生出身。据说他“生而英毅，自幼读书，颖迈不群”，博通经史，有意在科举仕途上与两位兄长一比高低。然而，他志大才疏，屡应乡试不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抱着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放弃举业，专心“研摩经世致用之学，锐意奋于功名。”^①他通过举办团练镇压农民起义的途径，终于挤进了清朝统治阶级行列。

蕴章排行第四，本名章钧，号和荃，1829年（道光九年）生。“年十二病目已而盲”，被迫放弃通过科举门径登上仕途的打算，据说，他“性孝友”，能够“先意承志”，深得双亲的欢心。他“以残废之身”留在家中，照料一切，免除了作官在外的兄弟们的内顾之忧。当然，他因“好谈经世务善理财”，也曾外出作过瀚章、鸿章的帮手^②。

凤章排行第五，本名章铨，号稚荃，资质中人，个性倔强，落笔潦草，曾随其父入京读书，弱冠南旋应试不果。他“究心于经世有用之书”，帮助其父办过团练，总理过霆军营务，还在江南制造总局作过事。他后来“乞假引退，侨居芜湖”^③，专心经营土地、商业和高利贷事业，成为鸿章兄弟中的首富。

昭庆排行第六，本名章钊，号幼荃，1835年（道光十五年）生。监生出身。据说，他“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文字得雄直气”^④，但在科举仕途上却不甚得意，只好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以求进身。他后因投靠曾国藩，讲求兵法，驰逐军旅，才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长女生于1828年（道光八年），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

① 李国松：《王考季荃府君行状》，《合肥李氏宗谱》，卷15，第20页。

② 刘秉璋：《清故中宪大夫侯逸道李公墓志铭》，《合肥李氏宗谱》，卷15，第26页。

③ 徐鼐：《李稚荃光禄公家传》，《合肥李氏宗谱》，卷15，第27页。

④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48，武功传三，第3—5页。

“生平静穆专一，居恒默默，不苟訾笑”，能承欢父母，调和兄弟，“患难提携”。鸿章赞扬她“静正有须眉丈夫风”。她嫁给同县张绍棠，张家较富裕，经常在经济上接济鸿章兄弟。后来，鸿章满怀感激之情地回忆道：“吾兄弟宦学，家屡空，奔走称贷。妹之舅以妹贤，又伟视吾兄弟，不待求请，辄资给之。吾兄弟婚宦之需，张氏之伙居多。”^①

次女玉娥，嫁给同邑费日启。她喜读《纲鉴》，通群书，善吟咏，著有《养性斋全集》。

出生在这样家庭的李鸿章，在生活道路的选择上不能不深深打上家庭的烙印。首先，这个家庭属于官僚地主阶级，但经济状况拮据，政治权势不大，具有较为强烈地提高家庭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其次，这个家庭推崇儒家伦理道德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希望子孙“策远志”，“出风尘”，成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忠诚卫士。

“少年科第”

鸿章在文安诸子中，排行第二，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他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的熏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少年时期的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他的启蒙教育，是由严父兼良师李文安进行的。1828年6岁的鸿章开始在父亲开设的家馆中学习。书房叫棣华书屋，又叫棣

^① 李鸿章：《清封一品夫人亡妹张夫人家传》，《李文忠公遗集》，卷4，第32、31页。

蓼书屋，是一所方塘花树环绕的水阁：“门临方塘，水光照屋。菊花三径，杨柳数株。”过去他的父辈们曾在“水阁谈经，柳堂论艺”^①，而今，这个水阁柳堂又成了他们小字辈切磋学问的场所。1834年当父亲到费氏墨庄就馆时，12岁的鸿章也陪同前往攻读。1835、1836、1838年其父连续三年赴京会试，无暇授徒，鸿章便拜堂伯父仿仙为师。此外，鸿章还曾“从徐明经游”^②。那时的鸿章，由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所以目光只局限于应制时文和试帖诗等，还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术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作为封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主要是汉学、宋学、桐城派古文和与之相对立的今文经学。鸿章的三位导师，无不崇尚宋学，有的还兼治桐城派古文，喜爱诗赋。其父致函仿仙说：

第近来学者之弊，舍本逐末，有才无行，举动尽皆浮妄，文章不求根柢，纵能弋获微名，终非令器所成，亦几何矣。足下少有至性，早濡节母之教，沈深经术，发为文章有序有物，砺节砥行，不苟取与，不与外事，早为乡里推重，经师人师，津梁后学，表正里闾，使同里诸子知所宗仰，不至流为外间坏习，幸甚，幸甚。^③

这封信中所说的，既是其父的学术见解，又是对仿仙学术观点的首肯。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文安批评的“舍本逐末，有才无行”的学者，不是别人，正是汉学家。“弃本贵末”^④是宋学家方东树对汉学家的评语。宋学家认为，读经应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而汉学家

① 李文安：《乙巳仲春都门寓宅寄示诸子侄》，《李光禄公遗集》，卷5，第6页。

② 李鸿章：《致三弟》，《李鸿章尺牍》，第1页。

③ 李文安：《寄兄书》，《李光禄公遗集》，卷7，第27页。

④ 《汉学商兑》序例。

却反其道而行之，毛举细故，埋头考证，“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①。

其次，文安赞赏仿仙的，并非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恰恰是他崇尚宋学和桐城派古文：“沈深经术，发为文章有序有物”。他认为，要阐发儒家典籍的义理，读书就“先须沈潜体玩，熟读熟思，以求实得要，洞悉古人立心制行，与人经世实在处，断不可诵言忘味，至赏奇析疑时，斯收丽泽之益。”^②而仿仙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才得到“沈深经术”的定评。他说仿仙“发为文章有序有物”，无非是肯定仿仙为文遵循了桐城派的义法说。义法说，是桐城派文论的重心。“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

宋学家认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③。“经济之学”，又称经世致用之学。研寻义理、经济之学，必须著意经史。李文安也正是这样训勉鸿章等人的。他致函玉坪说：

我辈经济学问，仍须根柢经史。……读书果能贯通，自能致用，真实见地还须在经史中求之。余阅锐、铜等文赋，气焰尚好，功夫亦熟，只见地未尽高超，未尽踏实。故前书示以用功之法，须著意经史，谅弟早见之矣！^④

鸿章的另一位老师徐明经，虽然生平事迹不详，但崇尚宋学却无疑义。鸿章致函鹤章说：

兄少时从徐明经游，常告读经之法。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弟亦不妨照此行之，经学之道，

① 《汉学商兑》序例。

② 李文安：《寄玉坪六弟书》，《李光禄公遗集》，卷7，第17页。

③ 《曾文正公手书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④ 《李光禄公遗集》，卷7，第17页。